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衣被天下

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

范金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衣被天下

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

范金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范金民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0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16618-0

I. ①衣… II. ①范… III. ①丝绸工业—经济史—研
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IV. ①F426.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7245 号

书 名 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

著 者	范金民
责 任 编 辑	王保顶 张惠玲
装 帧 设 计	黄 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1.5 插页 10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6618-0
定 价	6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本书系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的阶段性成果
并得到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资助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主 编 钱乘旦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前 言

本书所说江南,大体上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海,浩瀚的太湖镶嵌其间,基本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今天江苏省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五个省辖市,上海一个全国直辖市和浙江省的杭州、嘉兴和湖州三个省辖市。

在历史上,江南属《禹贡》扬州域。春秋属吴属楚,战国属越。秦属会稽郡、彭郡。汉属丹阳郡、会稽郡。三国吴晋南朝及隋属丹阳郡、吴兴郡、吴郡。唐属江南道,奄有升、润、苏、常、杭、湖六州。北宋属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包括江宁、平江、镇江三府和杭、湖、常、秀四州;南宋属江南东路和浙江西路,包括建康、临安、平江、镇江、嘉兴五府和安吉、常州二州及江阴一军。元代属江浙行省的江南浙西道和江南诸道御史台,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松江、江阴和集庆九个路府州。明代属南直隶和浙江布政使司,包括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杭州、嘉兴湖州八府。清代属江南和浙江二省,雍正三年(1725)太仓州由苏州属州升为直隶州,江南地区就为江苏、浙江二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太仓、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一州。

江南八府一州之地,唐代中后期起,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北宋特别是南宋时代起,江南的经济和文化地位日益突出。以明代论,洪武末年全國 2944 万石税粮,江南多达 668 万石,占了将近 23%。以清

代论,地丁银两占全国 10%强,漕粮占 34%强。

江南赋税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是与当地的种桑织绸、植棉织布两大支柱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渊源于远古、崛起于唐末的江南丝绸生产,到宋代三分天下有其一,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蚕桑之盛,丝绸之夥,质量之优,品种花样之繁,用途之广泛,地位之重要,声誉之隆盛,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而且直到 19 世纪中期一直引领世界潮流。当经由秦陇古道通向中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逐渐消失后,满载江南丝绸的大帆船就日益穿梭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为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所期待。直到现在,江南丝绸仍是中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的丝绸发展史,江南是一个关键地区;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丝绸是一个重要领域。

江南丝绸地位如此重要,因而历来为人所瞩目,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中国大陆学者,如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曾对明清江南官民营丝织业生产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他有魏东对于中国蚕业起源的探讨,刘兴林对于江南早期丝织业的考察,赵丰对于唐宋杭州丝绸的考察,张学舒对于两宋民间丝织业的研究,章楷对于明清江南蚕桑业的研究,段本洛对于近代苏州丝织业的研究,徐新吾对于明清江南丝绸生产方式及近代江南缫丝工业的研究,王翔对于近代江南丝织业特别是苏州丝织业的研究,徐仲杰对于南京云锦的研究,陈娟娟对于明代丝绸技术的研究,蒋兆成对于明清杭州丝织业的研究,陈学文、樊树志对于江南市镇丝织业的研究,严中平、张铠对于江南丝绸远销拉丁美洲的研究,李金明对于明代江南丝绸海外贸易的研究等。台湾有施敏雄对于清代丝织工业的研究,陈慈玉对于近代江南生丝出口和缫丝业的研究等。香港有全汉昇对于中国丝绸输向新大陆等地的系列研究。国外如日本有佐伯有一对于明代机户的研究,田中正俊对 16—17 世纪中国农村丝织业和城市机业帐房生产的研究,横山英对于清代城市丝织业的研究,小岛淑男对于晚清机户的研究,中山八郎对于明代地方织染局的考察等。美国有孙任以都(Sun, E-tu Zen)对于清代丝织业的描述,李明珠(Lillian M. Li)对于近代生丝出口的研究,伍若贤(Robert Y. Eng)对于近代上海丝

业的研究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博专家宋伯胤先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对于南京、苏州和盛泽等地丝织业的访谈和实地调查,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宝贵资料;业师洪焕椿先生整理的苏州丝绸碑刻和其他城乡丝绸资料,泽被后学不浅;明清史专家陈学文先生精心搜集的杭州丝绸碑刻和嘉兴、湖州地区的丝绸生产资料,嘉惠学林良多。

上述海内外学者的丰硕成果,为我们奠定了进一步研究江南丝绸业的坚实基础;他们讨论的诸多议题,提供的大量资料,也使我们得以开阔眼界,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拓宽一些新的研究视域,从而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在中国丝绸的起源问题上,前人或主张黄河流域,或主张长江流域,笔者认为,其实两者都是中国丝绸的起源地,不能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在中国丝绸的中心问题上,前人多主张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而到南宋完成,笔者认为,江南在宋代只是全国丝绸生产的三大中心之一,并不是唯一的中心,后来成为全国的中心,并不是由北而南转移过来的,而是其本身发展或超过其他地区的结果。江南蚕桑区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前人从未估算。笔者从田地消长的角度入手,将江南桑区正常年景的桑地估算为 160 万亩,在此基础上,每亩产丝 10 斤,则每年产丝约为 1600 万斤。在明代的官营织造问题上,关于中央织染机构,既有研究的表述较为混乱,关于地方织染机构,前人殊少考察,笔者主要利用地方志书,对于中央和地方织染机构的盛衰,作了比较性考察。明代的官营丝织业生产,同赋税钱粮的加派一样,明代中期起,也存在不断加派的情形,而对此加派,学界却几乎从未述及。笔者系统辑录《明实录》中的材料,结合明人议论,表列了明廷加派江南地方不断增加丝绸生产的过程及数量,探讨丝绸加派对生产形式产生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的官营丝织业生产,在崇祯即位后即下诏停止。笔者分析崇祯帝的诏令,利用地方官员和地方志书的记录,认为所谓停止的实际上只是中央官营机构的生产而非地方官局的生产,终明之世,江南地方官局的额定丝绸生产任务始终存在,地方官营生产也始终未曾停止。在明清官营织造的生产规模问题上,前人笼统而言,认为日益缩小。笔者通过

比较考察,认为就总体而言,明代中央和地方织染局明显大于清代,但就单个织染局来说,无论织局规模、机张设置,还是匠役人数、生产量,清代都明显超过明代。清代江南三织造,名气很大,但前人着重探讨织造官员本身,而对织局的丝绸生产反而略而不论。笔者系统辑录了相关档案记录,分别对三织造的生产规模、额定报销钱粮、实际生产量等作了数量统计,基本复原出三织造正常生产时期的实际生产情形。在清代官营丝织业的生产形式和运行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主张有“买丝招匠”和“领机给帖”两种制度。笔者利用档案,从制度规定和实际运作两方入手,通过考证工匠数量、报销口粮数和“领机给帖”的形式,认为两者完全是一回事,确切地说,前者指织造过程,后者指织造形式。在此基础上,笔者概括明清江南官营丝织业的生产形式:由明前期的徭役局织制,到明中后期局织与领织并存,再递变为明末清初的金派制,发展定型为后来的雇募局织制。对于明清时期的民间丝织业生产方式,学界有过长时期的讨论,却看法悬殊,表述各异。笔者通过考察江南各地丝绸生产的实例,特别是分析清代江南各地的帐房领织制后认为,民间丝织业除了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或小商品生产尤为突出,由明后期的简单协作发展到清前期的简单协作与包买主制相并存,并逐渐由后者占优势,这就是江南丝织业资本主义史前期的特征。在官民营丝织业的关系问题上,历来人们过分强调官营织造对民间丝织业的消极阻碍作用,笔者认为,实际是它们是互为影响的,官营对民营既有阻碍发展的消极的一面,也有促进发展的积极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从长时段来看,有利的一面更大于不利的一面,因而呈现出江南官营民营丝织业生产长期发展的历史现象。清代乾隆年间至咸丰初年每年解往新疆的“贸易绸缎”,一直有人探讨,但对其具体数量和“贸易”过程,却一直没有明细统计;至于其“性质”,国内外学者一直认为是由江南三织造生产的一种“供给”新疆少数民族头人的“俸缎”。笔者系统检阅了相关档案,表列了前后94年间每年的总数量、三织造的分配量,新疆六个点的分配量、贸易绸缎的价格和品种色彩等,清晰地勾勒出贸易绸缎的具体过程及其规模,并通过考证,认为“贸易绸缎”实际是由民间生产、经官局采办而解往新疆供贸易之用

的商品性绸缎。对于明清时期的丝绸贸易,既有研究成果虽多,但形象模糊,不够具体丰满。笔者发掘各地商人商帮活动材料,对明清时期全国的丝绸贸易乃至对外贸易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商品价值的角度,揭示出江南丝绸的重要地位。在明清丝织业工艺问题上,人们多主张织造机具到明后期再无大变化,笔者认为丝织业不但在明后期有了斜身式小花楼织机,以后更向斜身式大花楼织机方向发展,江南的丝绸生产,在工艺技术方面,到清中期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上述这些问题,笔者在明清时期江南丝绸业的七章及前此的一章内容中具体考察论述。弘治《嘉兴府志》谓,当地“衣被他邦而机轴之声不绝”^①。万历中期浙江临海人王士性,介绍其时全国各地的代表性特色商品时,称“苏、杭之币”^②,即丝绸。清初侨居吴门的思想家唐甄说,“吴丝衣天下”^③。乾隆《湖州府志》的编者称,湖州的丝绸,“沃壤邻封,衣被海寓”。^④清前期《盛湖志》标榜,吴江县盛泽一镇,“四海九州之绸帛皆来取资之……苏杭皆设局,天下之衣被资之盛泽”。^⑤自明代起,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棉布和丝绸商品生产基地,两大支柱性商品棉布和丝绸,都在国内外拥有广阔的市场,改变着人们的衣着生活。有鉴于此,本书定名为《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

①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二《农桑》引柳志,第1页。

② 王士性:《广志绎》卷一《方輿崖略》,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

③ 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中华书局,1955年,第158页。

④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〇《物产》,第1页。

⑤ 仲沈洙纂、仲枢增纂、仲周需再增纂:乾隆《盛湖志》卷上《分野》,第1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江南丝绸业发展的历史前提 1

- 一 源远流长的江南丝绸业 1
- 二 江南蚕桑生产的基本脉络 6
- 三 民间丝绸生产的持续发展 21
- 四 官营织造机构的地域分布 39
- 五 丝绸生产的技术与品种色彩 51

第二章 江南蚕桑生产的发展 68

- 一 全国蚕桑生产最盛的地区 68
- 二 蚕桑生产的商业化与专业化 83
- 三 鸦片战争后江南蚕桑生产的新格局 93

第三章 明代江南兴盛的官营织造业 103

- 一 中央织染机构的设置与运作 103
- 二 地方织染局的设置与运作 119
- 三 明代宫廷丝织品加派及其生产 131
- 四 江南地方织染局生产形式的演变 149
- 五 明廷停止官营织造问题 160

第四章 鼎足而立的江南三织造——清代官营织造 167

- 一 江南织局的草创及其生产 168
- 二 江南织局的生产形式及其生产者的身份 175
- 三 清代前期江南织局的生产格局及其生产量 186
- 四 清代后期江南织造的演变 215
- 五 江南织局对民间丝织业的影响 229

第五章 江南民间丝织业的发展 241

- 一 民间丝织业的兴衰 242
- 二 民间丝织生产方式的变化 263

第六章 江南丝绸的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 295

- 一 广阔的国内市场 295
- 二 兴盛的对外贸易 318
- 三 经营丝绸贸易的地域商人 371

第七章 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 383

- 一 丝绸贸易始末 384
- 二 贸易绸缎的数量及其地区分配 392
- 三 贸易绸缎的品种与色彩 402
- 四 贸易绸缎的来源与江南丝织业 408
- 五 贸易绸缎与丝绸贸易的性质 420
- 六 丝绸贸易的作用与影响 429

第八章 明清江南丝绸的工艺技术和品种色彩 436

- 一 织机的改进 436
- 二 花本的挑结 445
- 三 品种的创新 448
- 四 纹样的丰富题材 465
- 五 色彩的变化及染色方法的进步 469

后记 476

表 1-1	江南各地宋元明三代夏税丝帛数量表	16
表 1-2	北宋各类丝织品地区分布百分比表	32
表 1-3	南宋上供丝织品产地分布百分比表	33
表 3-1	明代丝织品加派数量表	134
表 4-1	清代前期江南三织局历年奏销织造银两表	188
表 4-2	清代前期苏州织局历年缎匹产量表	199
表 4-3	清代前期杭州织局历年缎匹产量表	204
表 4-4	清代前期江宁织局历年缎匹产量表	209
表 4-5	清代后期江南各织局历年解交缎匹数量表	221
表 4-6	光绪朝江宁织局采购缎匹数量表	225
表 5-1	明清苏州民营丝织业利润率表	294
表 6-1	明末清初唐船输入日本生丝数量表	322
表 6-2	清代唐船输日华丝数量表	331
表 6-3	明后期抵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数量表	343
表 6-4	1764—1911 年生丝丝绸出口数量表(1)	358
表 6-5	1764—1911 年生丝丝绸出口数量表(2)	361
表 6-6	中国和日本生丝出口比较表(1870—1911)	367
表 7-1	贸易绸缎数量及其地区分配表	394
表 7-2	贸易绸缎品种比例表	404
表 7-3	贸易绸缎品种色彩表	406
表 7-4	江南三织造贸易绸缎销银数量表	415
表 8-1	花楼机织机部件名称对照表	441
表 8-2	清末江南丝绸品种规格表	455
表 8-3	明末江南丝绸色彩表	471
表 8-4	明代前后期染色比较表	473

第一章 江南丝绸业发展的历史前提

明清时期的江南,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区,其产品衣被天下,畅销海外,丝织业从蚕桑生产到丝绸织造,从工艺技术到生产关系,无论是官营织作还是民间生产,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商品贸易,都达到了中国帝制时代丝绸生产的最高峰,在国家财政、地方经济和民众生活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江南丝绸这种在全国独一无二地位的获得,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历史前提的。

一 源远流长的江南丝绸业

江南丝绸生产的历史源头很早。位于宁绍平原、距今约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可以代表江南蚕桑、丝绸发展的源头。

1973—1974 年和 1977—1978 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工作,出土的文化遗物提供了当时人们对蚕的认识的有关信息。在一件牙雕盅形器上,刻绘着四条蚕纹,每个个体皆作弓背、屈体向前蠕动状。该器口沿下另有一周编织纹(图 1-1);一件残陶片上有虫食叶纹,虫作弓背屈体状,并沿叶缘开始蚕食,形象生动。魏东通过观察认为,它“和现代昆虫的足式、运动方式比较,极似天蚕蛾

科的幼虫”，而遗址出土的较多的骨、木、石制蝶形器，既是艺术生活的反映，也揭示了“当时河姆渡地区生活繁殖着大量的不同种类的蝶蛾”^①。尽管河姆渡遗址没有出土直接证明当时已经开始驯化野蚕的资料，但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善于吐丝的鳞翅目昆虫，并对它从成虫到幼虫进行了长期细致的观察，他们也一定会发现蚕丝的秘密并将其作为纺织的原料。该遗址出土的原始纺织工具，陶(石、木)纺轮、木质纬刀、磨光或刻纹的打纬骨机刀(匕状骨器)、骨制梭形器、木卷布棍以及骨针等等，与河姆渡人的丝织活动就有着直接的关系。同类纺织工具在河姆渡文化的其它遗址中也有发现，如1996年发掘的浙江余姚市鲡山遗址第9层出土了骨机刀^②，机刀由肋骨对剖后磨制而成，头部圆形，尾部有一小孔，长26厘米，宽3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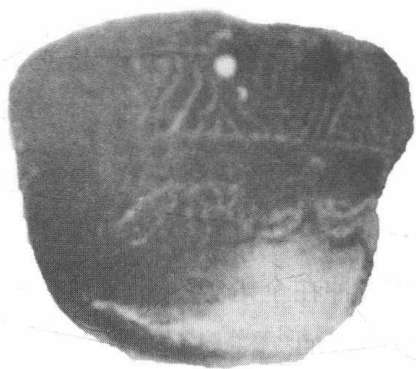


图1-1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带有蚕纹的牙雕盂形器

米，厚0.2厘米，与河姆渡遗址所发现的骨机刀如出一辙。鲡山遗址第9层的时代与河姆渡遗址第4层约略相当。河姆渡遗址以丰富的稻作遗存、骨、木生产工具和干栏式建筑体现的发达的木作手工工艺为特色，表明河姆渡先民已过着完全稳固的定居生活，这使蚕桑和原始丝织手工业的发展有着坚实的基础。

据王开发、张玉兰对沪杭地区史前气候的研究^③，公元前5500—前3050年是这里的第一个暖期，气候湿热，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珠江流域的气候情况，这样的气候条件极宜于桑树的生长。河姆渡遗址孢粉分析和动植物的鉴定研究结果也都显示，桑是该地区重要的植被之一^④，上海崧

① 魏东：《略论中国养蚕业起源于长江三角洲》，《中国农史》1983年第1期。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浙江余姚市鲡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

③ 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

④ 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